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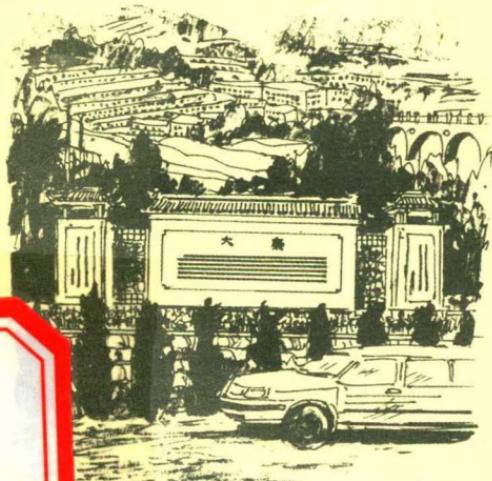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八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大寨变迁

孔令贤

著



山西东隅，太行中侧——大寨，一个土地面积 8 债，人口不足 500 的寻常山村，竟与神州近代农业史亲密结缘，始因贫困奋起，继则辉煌至极，在 20 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期又经历阵痛，实现了经营模式的根本转变，其典型辐射作用窗口透视功能，成为当时端正政治方向及农业改革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8辑)

大寨变迁

孔令贤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93-2

G·4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马玉山 | 马志超 | 于贵卿 | 于崇良 | 王克林 |
| 王志超 | 王宝库 | 王灵善 | 王振芳 | 王家壁 |
| 牛崇辉 | 田中仁 | 冯素梅 | 任茂棠 | 刘 巩 |
| 刘在文 | 刘纬毅 | 刘振华 | 刘晓丽 | 成葆德 |
| 齐荣晋 | 李元庆 | 李东福 | 李锐锋 | 吴广隆 |
| 宋丽莉 | 汤二怀 | 杨子荣 | 李建峰 | 张国祥 |
| 张捷夫 | 长鸿仁 | 罗广德 | 陈长禄 | 胡存悌 |
| 赵曙光 | 邹建国 | 降大任 | 郭维明 | 高 可 |
| 高专诚 | 荀正刚 | 柴泽俊 | 秦海轩 | 梁俊明 |
| 谢 恺 | 董永刚 | 董占锁 | 董瑞山 | 楚 刃 |
| 雷忠勤 | 霍润德 | | | |

目 录

| | |
|-----------|------|
| 引子 | (1) |
| 一、喜忧交织翻身曲 | (2) |
| 二、创业路上唱大风 | (6) |
| 三、丑小鸭荣膺明星 | (14) |
| 四、高天流云不胜悲 | (21) |
| 五、徘徊在转折关头 | (29) |
| 六、重振河山铸辉煌 | (34) |

引　　子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山村，居然跃上浩瀚悠远的历史天空，成为影响全国万千农村的一个耀眼明星和独特榜样，这在神州发展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它始因贫困奋起，继则辉煌至极，在20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期又经历阵痛，实现了经营模式的重大转变，其典型辐射作用、窗口透视功能，成为华夏文明史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它，就是山西东隅，太行西侧，一个土地仅逾8顷，人口不足500的寻常山村——大寨。

它，曾在上世纪60年代受到毛泽东主席多次表彰，称赞“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树为全国农村的样板，号召“农业学大寨”。

然而，大寨命运多舛。从立志改变人类难以生存的环境，在艰苦创业中创立发展大寨精神，到功成名就后，面对成绩荣誉给予的诸多挑战；从在生产建设、科学技术诸多领域纵横驰骋，创造层出不穷，到演绎于政治舞台，遭遇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困惑；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打拼创造，不断以全新业绩出人头地，到转换角色，陶冶心性，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大寨一路跌宕，奋勇前行，有过成功收获的欢欣，也有过挫折困惑的泪水。可以这样说，大寨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一段政治演变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

这里,让我们循着历史隧道,探索一代名村——大寨的变迁历程!

一、喜忧交织翻身曲

时光回溯 700 余年,当是成吉思汗子孙策马中原甫定,太行山中脊西麓小褶皱内一户人家落地生根。其时,方圆百里的人们只知此地乃 5 里外重要关隘虹桥关之营寨,设于汉末,后营寨废而荒丘成。逐故寨而居者,许是游兵散勇,抑或其他,不得而知,史籍亦无记。直至民国 4 年方以兵营之俗名“大寨”入志。

斗转星移,历史将大寨艰难地带入 20 世纪 40 年代。1945 年 8 月,这里响起欢庆解放的锣鼓。掀开历史的门帘,百姓们欣喜而胆怯地窥视着将要走近的新的生活。

此时的大寨,村庄破败,田野凋蔽,贫苦盈门,哀鸿遍地。长时期的阶级压迫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令一个原本人丁不旺的村庄仅留下 64 户,190 口人,每户不足 3 人。全村 800 亩土地,6 成归 1 户地主和 3 户富农所有,46 户贫苦农民仅有土地 144 亩,不足两成。“穷人头上三大灾:官税地租高利贷”;“扛长工,没铺盖;卖儿郎,当乞丐”——当解放的第一缕曙光降临时,大寨就以这样的内涵袒露于世。

然而,毕竟共产党来了,穷苦百姓有了出头之日。不久村政权建立,上级亦派人在这里发展党的组织。1946 年 1 月,贫农贾承福入党。接着贾承财、贾进财先后走进党的队

伍。3人组成党小组，由贾进财任组长。有了党组织的支撑和领导，大寨土地改革搞得轰轰烈烈。至1947年底，近7成的土地和70余间（眼）房窑分给了原先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中农利益也得到合理保护。翻了身的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妇女们则走出家门，担当起春耕生产的重任。

那是1946年隆冬，猛烈的西北风吹不散人们心中翻身解放的热情。贾进财从区上开会回来，向大柳树下聚集的人群宣传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原来，根据土改后的农村形势和参军支前任务繁重、后方劳力奇缺的实际，借鉴推广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经验，一个“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热潮，伴随着解放战争的猛烈炮火，正在解放区农村蓬勃兴起。

大寨第一个互助合作组织是贾进财为组长的15户变工组，那是一个劳力、土地、牲畜、农具“四好”的强户组合。自愿碰伙，精兵强将联合，本为当时政策所允许，意在适应彼时农民的觉悟程度，以便逐步引导，却在村里引发轩然大波。有个翻身的贫苦农民叫陈永贵，年轻力壮，一身农活技艺，全村有名的好劳力、全把式。此人旧社会苦大仇深，其父在当地扛长工，为穷困所逼，卖掉了永贵的生母和胞弟，又将其托付于大寨一户人家收养，自己最终自缢于30里外的老家祖坟松树上。土改时，和贫农梁治云父子、韩黑妮母子伙分到富农的一处宅院。互助合作的大旗乍一举起，陈永贵起初归附于贾进财变工组麾下，却看着同院居住的穷苦娃梁便良、贾承联、贾吉义和邻居老汉李喜庆、贾根元被排斥在外，心里很不是滋味。旧社会颠沛流离、孤苦逃生的心路历程，令这个五尺高的血性

男儿对弱小鳏寡有一种先天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他毅然退出“四好”撮合的互助组，将4个老汉和8个娃娃集合起来，成立互助组，后来被称为“老少组”。

前者无意，后者有心，一开始，性格倔强的陈永贵便带领“老少组”向贾进财互助组发动挑战，意欲一决高下。正月初三，村人尚在过年赋闲，“老少组”便笨鸟先飞，积肥备耕。一早百早，一年间样样农活赶前；且团结互帮，谁也不计较得失，一家人似的。如此氛围，劣势转化为优势，令村人刮目相看。而性格温和的贾进财，对陈永贵互助组的发展打心里高兴，对其或明或暗的挑战似乎不甚察觉，惟一心一意搞他的互助组，办村里的事。大寨村里这两个互助组，就这样沿顺各自轨道，发挥一己优势，向前发展。至1949年冬，贾进财互助组已拥有30户，陈永贵互助组发展到29户。全村9成农户聚扰于这两面旗帜下，正蕴酿着过转年办成常年性互助组呢！

此时，大寨党的队伍已有很大发展。1948年8月，已有6名党员的大寨单独设立党支部，由贾进财担任党支部书记。这年冬天，贾进财亲自介绍，党支部接受陈永贵为中共党员。

还在党支部刚组建时，贾进财召集党员干部研究村里工作。生产互助龙腾虎跃令他鼓舞，而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供销合作以解翻身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燃眉之急，却明显滞后，几次受上级督促。情急之中，这个性格沉稳的庄稼人坐不住了，当即拍板：将土改欲分给群众而尚未兑现的500多石小米折价入股，以此作周转资金开展供销商务活动。

开始,供销社以小米作资本换回布匹、棉花、日用杂品等生活用品销售给群众,办得还可以。但小打小闹终归赚不了大钱,于是决定组织长途贩运,肩挑小米翻山越岭,远涉一二百公里赴河北省邢台、赞皇兑换棉花、布匹,归来游村串乡出售。然而这一着失算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全国性物价波动,棉花布匹价格暴涨,凡经营者无不蚀本。大寨供销社惨淡经营未及两年,最终赔得仅留30多石小米。

初战折戟沉沙,将人们致富美梦撕得粉碎。贾进财仍不甘心,忍辱负重,苦口婆心,终于说动26户乡亲,集资230石小米,开办煤窑。孰料,命运好似故意捉弄人。断断续续开凿了两年,好不容易眼看着直筒子窑已挖下去,且有煤层露头,集资粮将耗已尽,却忽然发现边墙渗水,愈演愈烈,还不等弄清怎么回事,“老虎水”已勃然喷涌,迅速占领了掌面巷道。那时又没有抽水设备和治水经验,大寨百姓泪眼婆娑地眼看着两年辛苦付之东流,只有咒骂、哀叹、抱怨,村里村外一片凄然景象。

办供销、办煤矿连连失败,连翻身的老本也折了,贾进财叫天不应,呼地不成,好多天躺在炕上起不得身。陈永贵在供销社解散时已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和生产委员,既是责任的驱使,又是性格使然,对眼前的一切不得不深深思考。旧社会的苦难经历使他认定,不务农业正本,“庄稼搅买卖”,是造成穷富分野的万恶之源,并非翻身农民奔向富裕的光明大道。思想明白了,就在党支部会上斗胆诘问,直奔主题,几次弄得贾进财瞠目结舌,十分尴尬。

翻身后日子过得快。当历史迈进20世纪50年代门坎

时，大寨70户人家，除几户地主富农外，全部进入了分别由贾进财和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而同时，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体经营的不稳定不可靠性，村里又出现了卖地买地、新的贫富分化苗头。对此陈永贵分外上心，几次在党支部会上提出问题。当1952年县委提出在党支部领导班子强、互助合作基础好的地方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区委提出转社要求，但未被批准。

而对贾进财来说，自从参加了安排初级社试点的三干会，便预感到农村又一个变革高潮即将来临。由组转社，他举双手赞成；而面对创办农业社的艰巨任务和诸多矛盾，却怀疑起自己的工作能力来。思来想去，一个念头终于在脑子里坚定下来：推荐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主意拿定，进财就向永贵流露此意，陈永贵自然不肯接受。贾进财便径直找区委，直言自己的工作能力与即将到来的工作任务的差距，力荐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如此三次，终于真情感人，区委接受了他的建议。

1952年冬季整党即将结束时，大寨党支部改选，陈永贵当选为党支部书记，贾进财担任副书记。大寨党支部由此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交接。

二、创业路上唱大风

1953年，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昔阳逐渐走向高

潮。县委决定当年发展23个初级社，其中就有大寨。那年元旦刚过，陈永贵和准备担任农业社会计的贾承让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办社培训班，回来便向乡亲们宣传政策，扯起办社旗帜。

那时节，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尽管办初级社是个新事物，但有党中央号召，陈永贵擎旗，不几天便有49户报名入社。自然也有人等待观望，发不满之言。县委考虑初级社甫办，经验不足，为稳步发展计，批准大寨初级社规模为30户。经过酝酿筹备，初级社宣告成立。选举陈永贵为社主任，贾承让为会计，梁便良、宋立英、赵大和为社务委员。

陈永贵也许不会想到，同私有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农民，身入集体容易，心归难。初建社，土地以实际产量作价入股，有人采取瞒天过海之策高报产量，陈永贵明知底里却不当面揭穿，而是将自家的13亩地37石产粮压低，报了个28石。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一着确实有着莫大的震慑带动作用，保证了土地作价入社的顺利完成。

办社头一年，人们生产热情高涨，村委会又在评工记分劳动管理上狠抓了一把，到秋天一看，农业社庄稼长得就是出色，丰收在望。那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由陈永贵作办社一年总结和扩社动员。当讲到农业社亩产240斤，是大寨历史上最高年产，超过互助组和单干户时，有个人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吹农业社有什么优越性啦，我单干，一亩地打300斤呢！”一石激起千重浪。经他这一搅和，原本气氛热烈的会场瞬间冷寂后舆论迅速逆转。陈永贵却不急不慌，灵机一动，和在场的几个干部商量后，将上级安排从那

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工作率先予以公布,要求无论农业社,还是互助组、单干户,统统按自报产量计算售粮,产多卖,产少少卖。这一着令那个自吹亩产300斤的人陷入自织的罗网,赶忙改口承认不该向农业社挑衅,自己实际亩产不过100多斤。谎言不攻自破,也使这个历史复杂的人背着破坏合作社的黑锅,几十年间抬不起头来。大寨阶级斗争从此开了先河。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骤然加快。大寨经过紧锣密鼓两个月筹备,12月26日摘下初级社的牌子,挂出“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招牌。牲畜农具作价入社刚刚结束。县委忽然通知大寨和周边四社合并,成立规模更大的高级社。翌年1月27日,五社合成的“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挂牌。却终因仓促上阵,随处可见粗陋疏浅之痕和遗留问题。更重要的是,人为拔高生产方式,并不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小团体意识和封建宗法势力,各地都唯恐权力出村,肥了他人苦了自己。客观规律重重惩罚了违逆于它的主观愿望,五社合并成的大社未足周岁,便于当年秋天夭折。之后,陈永贵便一头钻在大寨,以超常的智慧热情,聚精会神地塑造自己的杰作。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波三折,令陈永贵悟出个道理:这重要,那重要,人的问题最重要。走集体化道路,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还必须将人心归拢进集体,拴牢在社会主义战车上。从此,大寨党支部开展“人心之战”,坚持思想政治工作,首选目标为教育改造那些离间削弱集体经济的人事,同时加强日常思想教育,一点一滴灌输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利用传统饭场，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安排村里工作，分析形势，排解纠纷，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便是他们坚守的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名之曰“饭场会”。

大寨地处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东南高，西北低，七沟八梁将一面坡上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坡地为长短参差、里高外低的条田，土层极薄。梁地秃边少堰，年年坍塌，地块越来越小。河沟则是乱石滚滚，无法耕种。几近不毛之地，堪称人类生存之极限。农业社建立伊始，党支部便提出规划，用10年时间全面治理荒沟秃岭，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以集体力量改造穷山恶水的实践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实践“10年造地规划”首仗选在白驼沟，用18天时间，投工1500个，在一条1里半长的乱石沟里打坝24条，造地5亩。初战告捷，陈永贵兴奋异常，提议将此沟更名为“合作沟”，以纪念农业社的第一个胜利。之后乘胜进军，1954年冬治理后底沟，造地11亩。1955年冬，先治理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分别造地10亩和8亩。接着，集中力量大战狼窝掌。此沟乃大寨第一大沟，3里多长，4丈余宽，里高外低，坡陡流急。首治二治，建造的大坝均被洪水冲垮。在众人一片哀怨声中，陈永贵并未气馁。经过反复勘察分析，总结经验教育，终于想出建造弓形坝以抵御洪水的办法。1957年冬三战狼窝掌，挖深坝基，筑起下宽上窄呈宝塔状的弓形大坝42条，造成梯田22亩。此后几经洪水，大坝稳如泰山，治理狼窝掌终获成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大寨用5个冬春治理了合作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后底沟、狼窝掌5条沟，造地56亩。

1958年是神州头脑发热的年代。8月间，办人民公社的消息一传来，一向思想激进敢为人先的陈永贵坐不住了。短短几天，他串连了武家坪、金石坡、高家岭等7个高级社主要干部，组织起64名干部群众代表，8月21日开赴县城，向县委请示：坚决要求办人民公社！3天之后，昔阳县首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11月，进一步扩大为原105个高级社的规模，更名为城关农村人民公社。

然而，公社易建，运行艰难。一大二公的组织特性，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令基层的经济活动颇受掣肘；生产资料、劳力调配、产品分配高度集中，带来贫富拉平的弊端，严重挫伤着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此时，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土地之烈火也在神州大地炙烤。几股风一搅和，弄得陈永贵百思难解。那年冬天，城关公社欲办万头猪场，电令调集各管理区的猪集中至公社。电话几次打到大寨，陈永贵想不通，硬是顶住了。那时节，村外跃进烈火冲天烧，大寨却无登台打擂，无口号震天，无胡吹乱侃，无砸锅卖铁；不是陈永贵有先见之明，对“五风”自觉抵制，而在他心里，矛盾着对人民公社的热衷追求和其中有些做法的严重反感。此举不过是性情的无奈和无奈的性情罢了。

在那些乱云飞度难以自己的时日，大寨总是力排万难，实实在在办自己的事。“买卖说谎赚了钱，庄稼说谎耍了拳”，按照这个朴素的传统思维，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办成了许多大事。最为人称道者莫过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初级社伊始，出于不增加群众负担的考虑，大寨就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到后来，他们越来越感到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对

领导生产指挥生产,对联系群众密切干群关系,对接受群众监督,好处大着呢!于是逐渐形成制度,雷打不动。党支部对党员干部约法三章:凡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不好好参加劳动的人就当不好干部,随时可能被撤换;干部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为了严格这项制度,生产队专设一名记工员给干部及其家属记工,每五天通报一次。党支部还定期检查党员干部参加劳动情况,予以公布。如此,规范了干部参加劳动。除重病和外出开会,干部每年劳动都达到300天以上。无重大事情,不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办公。在劳动中干部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并同工作结合起来,做到腿勤、耳勤、手勤、眼勤、脑勤、嘴勤,很得群众爱戴和信任,在全村形成了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铁拳头效应。

勇闯科学迷宫,不断探索掌握客观规律,力求让有限土地奉献尽可能多的粮食,是大寨办的另一件实事。那时节,他们将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作为显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改造贫瘠土地的同时,不断改进传统技术,引进新科技成果,实行科学种田。从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到作物播期试验、扩大高产作物种植,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搞科学试验、科学种田的兴致越来越高。1958年,当神州大地欲求建设高速度而鄙视科学、超越规律时,大寨又扎实进行玉米深种、深耕、深刨的“三深”种植,小麦地里移栽谷子试验,打时间差,令这里也像江南一样,实现了一年两作。

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全党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

点错误，加上连续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神州步入全局性严重困难时期。大寨由于较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方针和扎实推进的作风，工作整体发展是健康的，应对困难的能力亦较强。陈永贵以敏锐的目光，慎密的思考关注着局势变化。他对困难形势下显现的“资本主义苗头”是那样难以相容，对调整中贯彻“坚决后退”方针可能出现的问题那样充满疑虑！其时，全国农村调整生产关系，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昔阳县百分之七八十村庄都实行了生产队核算，陈永贵却态度强硬坚持大队核算。县委考虑大寨的实际情况，批准了他们的请求。根据上级指示，昔阳县开放集市贸易。陈永贵从有人一夜间欲购大队多年积存的奖售香烟，看出了“资本主义”苗头，赶忙在饭场会上予以批判制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多日又出现有人装病不参加生产而到县城摆摊之事。大寨党支部对此大加挞伐的同时，对全村社员约法三章：全心全意办好集体事，集中精力种好集体地；只能按规定耕种自留地，依政策经营家庭副业；不准刨小块地，不准借副业生产之名搞“黑市”交易，不准个人外出赚钱！自然，在陈永贵看来，困难当头，首先警惕提防的是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后，这种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坚定。他甚至摆出主动进攻态势，向他所认为的阶级敌人叫板，以至发生公开批判一个富裕中农向干部送毡的事儿。对大寨以外，他也主动向“资本主义歪风”挑战。1962年县城“八一”物资交流会时，大寨青年专门在卖高价饭菜的摊点前叫卖低价馒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此搅乱“高价”市场，便是其得意之作。

与此同时,大寨以极大的热忱,不遗余力帮助兄弟队战灾度荒,将助人为乐风格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为国分忧紧密结合起来,同抵制“资本主义歪风”唱异曲同工。有个统计数字,在1959年至1963年的5年中,大寨总共平价售出或无偿借出粮食7万斤,谷草14.5万斤,谷糠5万斤。每个数字背后都有动人心魄的故事。1962年秋天,困难阴霾即将过去,大寨高风也演绎至高潮。那天有个讯息传至陈永贵耳中:巴洲供销社欲售一辆胶轮大车,连车带两骡两马共6000元,价格便宜。他便想到尚未有大车的金石坡大队,遂由大寨垫支,给他们买下了那辆大车。

此时,大寨已在合作化道路上走过了10年。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威力,大寨精心打造了一个铁打江山。包括设立专门政工干部,利用家史、村史、合作化史开展多形式多层次阶级教育,办好读报、广播、黑板报,开展“一帮一、一对红,一带二,一片红”活动诸项内容在内,一整套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教育改造农民的工作得心应手,事半功倍。踏着时代节拍,生产建设迅速发展。继三战狼窝掌之后,又乘胜治理麻黄沟、老坟沟。至1962年底,“十年造地规划”提前全面完成,原先的4700多块零星土地被改造成2900多块整齐的条田,其中三成多为堰高如枕、地平如镜、保水保土保肥的水平梯田,还新增80余亩良田。这些土地,经过大寨人巧手耕耘,已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随着选用优种、使用农药、人工授粉、合理密植、因地施肥、改良土壤、适时播种、死踩活踩、套种复播、“四不专种三不空”诸多科学种田措施的使用和推广,大寨土地一改往昔贫